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

zai lishi bian Shang de LiaoWang

危兆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

危兆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 / 危兆盖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97 - 3440 - 7

I. ①在… II. ①危…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6297 号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

著 者 / 危兆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李 娟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440 - 7

定 价 / 39.00 元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17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历史边上的瞭望（代序）

我们这一代生长于“文革”中的人，少小以至青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都带着那个时代“左”的痕迹，而且这个痕迹有如身上的胎记，即使后来想抹也不大容易抹得掉。譬如，我们接受的唯物史观就带有那个时代的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的缺陷，并不完全“科学”，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唯物史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完善和丰满，但“左”的痕迹仍烙在每个人的心底，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所以在比较正式场合，我们有些人总是要口是心非地演双簧。

但时代真的在变化，计划经济渐变为市场经济，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日新月异。当然，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没有谁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少小或青年时期所受教育的层面，扑面而来的新思潮不断地丰富、更新着我们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认知，有时难免还要生发出“今是而昨非”的感慨。正是在这种新旧交织、交战颇为剧烈的时代里，我辈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表里割裂的两面，内心或许是这么想的，但表现出来却非不这么说或这么做，而偏要那么说或那么做。尽管自己私下里有时也觉得那么说或那么做不好，但只因平时那么说或那么做的太多了，习惯成自然，也就不以为迁了。悲哀啊，真的悲哀。

我是学历史的，毕业后又长时间做史学编辑，在一般情况下，当然相信有所谓历史规律。譬如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新陈代谢，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天上日月有阴晴圆缺。这些规律谁说不然？谁

又能否认或违背？但如果讲历史只讲规律，把规律变成教条，变成圣旨，否定人类历史的多样性，以规律来框住生活，用死的来管住活的，谁又受得了？而事实上，又怎能框得住、管得住？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拥有无上权威的武则天一时心血来潮，欲令百花同时开放，结果如何？可能吗？平时读历史读的逐渐多了，搞历史搞的逐渐久了，对于无处不在的规律，内心也很纠结。譬如五种社会形态，我也相信，而且相信人类一路走来一定是在不断进步，日新又日新的，但若由此认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就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就没有例外？譬如征之以中国历史，就觉得好像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在多看了些今人和前人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后，就更觉得有问题。只是由于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不那么深，认识不那么透，也就没法儿较真，只好学孔子，“吾从众”。

历史或许真有所谓规律，历史或许真的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我相信这深藏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不是每个凡夫俗子都能认识得了的，能够洞悉规律的或许只有极个别的天纵英才；何况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若干人为总结的规律也完全可能适合于此而背逆于彼，照套照搬，极有可能误己害人；而且对于只取一瓢饮的普通民众而言，也不一定非要把心思、精力用在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上。开口闭口都是规律，听着都有点累的慌；如果着意于那规律以外的历史、那有血有肉有故事的历史，岂不让人惬意快活得多。

当然，历史之本身无疑是真实的，可能因为时间长了，真相往往被遮蔽被尘封，所以研究历史要求得本真，其实也不容易，有时甚至穷其一生，也不一定发现历史之本真；相反，与历史之本真擦肩而过也不是没有可能。记得上中学时，英文课有一篇课文《盲人摸象》，大意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就以为大象像什么，摸到耳朵就以为像扇子，摸到腿就以为像柱子，摸到肚子就以为像一面墙，摸到尾巴就以为像一根绳子，如此等等。我想，凡夫俗子研究历史，差不多就如同盲人摸象。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每一个研究者都只能接触一部分历史资料；历史本真或许包罗万象，而每一个研究者都只能触及一象或数象，而不太可能是全象；但可悲而又可叹的是，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研究者往往认为自己看到的那一象或数象就是历史的本真，就是历史的全象，而别的人表示不同意见尤其是与经典相左的意见，他们就视如洪水猛兽，群起责之。呜呼，吾何言哉！

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重要前提，史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门类，自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以为作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或为稻粱谋的历史研究者，接近历史或研究历史，完全可以不去探讨所谓历史规律，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历史的长河中随意地取一瓢饮。但也不是全无顾忌，因为盲人摸象，其结论毕竟是错的，所以如果要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形成文字公开发表，也还是要守住某些底线：一是要用良知感悟历史，要善意地理解历史、诠释历史，而不要恶意地误读历史、歪曲历史；二是要保持自己对历史认知的独立性，不要人云亦云，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尽可能地去再现历史的场景，实现与古人的某种对话，独立地完成自己对历史的把控，形成自己对历史的个性解读；三是要相信历史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的真相在后人的不断努力下是可以不断接近的，尽管这条路可能有些漫长。如此，阅读历史，才可使人明智；研究历史，也才能接近本真。

搞了大半辈子历史，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如此懵懂，可见真的是不堪造就之朽木，没有登堂入室的希望了。这里收集的数十篇小稿，只是平时零敲碎打的涂鸦之作，准确一点说，只是站在历史之门入口处的几眼瞭望，只是一些很不成熟的读书笔记或者读书体会，如同盲人摸象，是个人触摸历史、把玩历史时的一点感性认识，根本谈不上是严肃和严谨的研究。虽然有时也想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但学书既未成，学识又浅薄，才力更难胜，所以弄出来的东西往往词不达意，甚至偏离正轨，贻笑方家，自是意中事。好在古人有言：“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既然世间万物寻无可寻，既然是盲人摸象，那么，是非对错，就暂且抛开吧。如此，把它奉献给读者，不管是知我罪我，此心或稍可自解矣。

是为序。

目 录

儒生的官瘾	1
说“虚骄”	4
困之为败亦大矣	7
说朋党	10
士类的命运	14
清代文字狱闲话	19
文字祸福	21
文人之间的相轻与相敬	23
玄奘译经的文化意义	27
孔子重“和”	30
“历史”的和“艺术”的曹操	35
操胜绍败之间	38
曹操的用人智慧	42
文人为何不喜欢曹操	46
大唐盛衰集一身	48
漂泊的诗圣	52
肃贪还是纵贪？	56
至死不悟的崇祯帝	59
邑有流亡愧俸钱	63
晚清外交官的爱国情怀	70
赤手成功 万方衣被	75
兴国货 挽利权	78
爱国著作家魏源	81

先行者的寂寞	84
独立天涯谁与语	87
《使西纪程》与郭嵩焘	94
一书激起洞庭波——王闿运与《湘军志》	98
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01
行走在维新路上	107
逼上梁山	112
“有容”乃大的政治——章士钊对民初宪政的设计	116
幽暗荒原上的战叫	126
欲替中国开出一条新路——梁漱溟论民族自救与农村复兴	132
民国有个翁文灏	138
智者蒋廷黻	148
盛世梦	157
离我们远去的“大家庭”	159
社会风俗变迁感言	163
寻根要有度	166
文化的消费与生产要重视高科技	168
矛与盾	172
“甲午”：我们要永远铭记	174
中华民族新的觉醒与奋起	178
冤乎？不冤乎？方伯谦研究又起波澜	184
辛亥断想	191
从东厂胡同开始的故事——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	200
士不可不弘毅	206
风正一帆悬	213
有感于左宗棠教子	216
学风刍议	218
历史人物评价琐谈	220
学与仕皆难	225
治学漫议	228
怀念恩师张守常先生	231

儒生的官癮

写下这个题目，不觉有辱斯文，因为广义地说，儒生即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心之所系。因此，即使他们“仕”而成“癮”，那也多半是因心系庙堂或心忧天下所致，于情于理似皆不必苛求。但一想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虽已退处社会的边缘，而“官癮”却丝毫不减，就觉得把儒生的做官情结拿来解剖一下，或许不无裨益。

被儒生尊为圣贤的孔子最早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此后便被读书人奉为圭臬。做官必从读书始，读书一心为做官。到了唐朝，国泰民安，出了很多大诗人，写了很多好诗。可除了贾岛等几个痴痴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之外，大部分是把写诗当作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被诗坛视为“鬼才”的李贺就发出过“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慨叹。被尊为“诗仙”的李白，其官癮也大得很。李白写诗只是业余爱好，心之所系首在长安。他的《与韩荆州书》读来就肉麻，“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其实，识韩荆州就是为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以诗才自负的李白既想做官又不愿意考科举，一级一级往上爬，所以就梦想走捷径，希望凭着自己几首小诗而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他毕竟是诗人，对官场的认识也太少，于是他走的以诗“干谒”当道、谋取进身的仕途之路比考科举还要漫长。见召进京时已是42岁，过了人生“不惑”的年龄。可是他居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份高兴劲就如得了糖果的小孩，真是虽到不惑之年而“惑”心不去。被尊为“诗圣”的杜甫，因为出

身于书香仕宦之家，自小就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铩羽而归。无奈之下，他也以诗干谒权门，并在长安蹭蹬十年之久，才谋到一个县尉的低级差使，觉得很没面子，便没去赴任。

当然，古之儒生那么多，自然也有身在官场而能从官场中超脱出来的，苏东坡即算一例。他虽然也有官瘾，因为如果只写几句“大江东去”的词，而没有官俸，朝云就不能安心侍候他了。但他虽入官场却又深知自己“满肚皮不合时宜”，于是对个人升降并不特别在意，宠辱不惊。只可惜，大多数的传统儒生不能达到这一步，所以一生总是为官瘾所困，及至醒悟，已为时晚矣。正如袁宏道所云：“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俭于书生。至于劳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机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尽。”至于那些把“劳苦折辱”当享受的官迷们就又如清道光年间的宰相曹振庸所形容的：“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逢，歹也弥逢。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这当然只有一副奴才相，而没有半点小孩嚼蜡的感觉，当然所谓的良心也早就被狗吃了。

梁启超曾形象地刻画了晚清士人挤向北京官场独木桥的盛况：“居城厢内外旅馆者恒数十万，其十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而其住各会馆及寄食于亲友家者，数且相当京师既若是矣，各省也莫不然。大抵以全国计之，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问其皇皇求官之故，为作官荣耶？为作官乐耶？皆不然，盖大率皆舍作官外更无道以得衣食。质言之，则凡以谋生而已。”这真是说得很到位，读书为了做官，而之所以要一门心思做官又是为了谋生。读书人除了读书、做官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技能可以找到谋生的出路，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又可叹。

既然以做官为谋生之手段，这“官”做得如何？是“清官”还是“贪官”？就难以预料了。这些人恐怕早把圣贤教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丢到爪哇国去了。因此，袁宏道又说，这些人是“贪欲无厌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牛亦得，作马亦得，作鸡犬亦得，最为污下，最为可厌”；至于那些觉得做官有无穷滋味的奴才就更是觉得“愈劳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尽，不穷其味不止。若夺其官，便如夺婴儿手中鸡子，啼哭随之矣”。

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还有很多做着官的和很多想做官的，但这做官的情结毕竟在日趋淡化。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如今的读书人已从社会的中心退到社会的边缘；二是因为社会的进步，谋生的渠道多了，发财的渠道也多了，大家不必再挤官场独木桥了。所以，吾辈遭逢今日，实在比古之儒生要荣幸得多。因此，假若你做不了官，亦不必特别在意，而应当心境恬然，美滋滋地享受眼下多彩的人生！

原刊《光明日报》2002年2月9日

说“虚骄”

“虚骄”一词大概最早出自《庄子》。《庄子·达生》讲了一个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故事。周宣王急不可待，十日一问，但纪渚子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第一次答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第二次是“未也，犹应响景”，第三次是“未也，犹疾视而盛气”，第四次才勉强说“几矣”。这个故事是借养鸡讲养心的道理，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学会沉得住气，意志坚定；否则，心浮气躁，将一事无成。虽然先秦时期的庄子就认识到这一人生哲理，但后人对这类先哲之言好像并不特别在意，因而历朝历代都不乏因虚骄而致祸败的例子。

乾隆帝对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视为奇货可居的贡物一点也不感到稀罕，还夸口说什么“天朝大国，无奇不有”。这种态度被后人视为典型的民族虚骄心态，甚至以此作为解读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大致不错的，但又必须注意到，后人得出这一认识主要还是因为以今视昔，可以历史地看问题，所以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占了一回充当事后诸葛亮的便宜。而按诸实际，平心而论，当时的乾隆帝东征西讨，江山一统，万国来朝，也是事实，所以在英使面前说几句大话的资本是有的，虽然有那么一种凌人之气，但这“气”其实来得并不怎么“虚”。

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总是打不过西方列强，而满嘴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又不愿师夷长技，所以越是挨打，越是滋长一种虚骄之气。在19世纪60年代，高唱“臣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调子的士大夫坚决反对洋务运动，反对学习西方，洋务派被逼急了，

让他们拿出抵抗西方坚船利炮的法子，大学士倭仁倒也慷慨陈词：“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向清帝建议，只要“以忠信为甲冑、礼仪为干櫓”，就能轻轻松松地征服夷人；反之，如果像洋务派那样，“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结果呢？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就不消说了。弄得最惨的，是那位西太后，不但个人的那点虚荣之心、虚骄之气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大憾国家民族之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虚骄的教训实在是够沉痛的。但后来人好像并未从中吸取多少教训，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在与日本军国主义做生死搏斗的时候，还有人提倡什么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人个个仁义，这就天下无敌”。这种大言不惭，这种虚骄误国，真是比阿Q还要阿Q。

大概因为在西方的炮舰政策之下无论怎么强调“华夷之辨”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同时也因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所以即使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也难免在虚骄之后又生出一种自卑的心理。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就弥漫开来。而这时候，来华的西方人也正是一副盛气凌人模样，没几个愿意正眼去看中国文化。在这种内外交侵的被动局面下，民族自信心也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号称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唯科学主义弊端终于暴露出来。在那些为西方文明的健康发展寻找药方的西方学人中，有一部分人终于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文化的人文特性颇感兴趣，难免说几句恭维话以肯定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有趣的是，在中国立马就引起强烈反响。生活在周围普遍笼罩着颇为自卑甚至使人窒息的空气中的国人，好像溺水者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激动得不得了，虚骄之气也随之而生。梁启超是主张变法维新学西方的，可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转了一趟回来，就号召中国青年“开步走”，到西方去传播中国文化，拯救那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人。倒是全盘西化派迎头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如胡适说：“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

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全盘西化固然不足取，但胡适在这一点上还是对的。虽然唯科学主义不是万能的，但不讲科学光讲仁义道德显然是万万不能的。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言，秦国的败亡缘于“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的确是警世妙语，但愿今人长思之亦常鉴之。

原刊《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3日

囿之为败亦大矣

《吕氏春秋》记曰：“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囿也。夫人有所囿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囿之为败亦大矣。”一句“囿之为败亦大矣”，犹如醍醐灌顶，足以使那些自作聪明、利令智昏者警醒。但从历史上看，历代身败名裂之人，又何曾从前言往行中吸取教训了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若论政绩，秦代的李斯大概称得上是一代名相。他能从楚国的一个“上蔡布衣”跻身到“人臣之位无居臣上”的秦国丞相，其过人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智慧是不言而喻的。以下几点足以展示他那高超的政治智慧。首先是他在荀子学成帝王术后，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准确判断：“楚王不足事”，关东的六国“皆弱”，只有“欲吞天下”的秦国可以为他提供“建功”的机会。缘此，他毅然作出了西入秦的决定。其次是在秦始皇下令“逐客”时，身为“客卿”的李斯敢于逆龙鳞，向秦始皇上书，晓以利害，阻止了秦始皇愚蠢的逐客行为，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留住了一批难得的来自关东六国的优秀政治人才。再次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正由封建转变到郡县的时代大势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以勇者无畏的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坚决反对淳于越等人的“封建”说，主张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后来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些政治举措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

如果李斯的个人历史就此停步，那就正如司马迁所说：“斯之功

且与周、召列矣。”遗憾的是，具有如此高超政治智慧的李斯，居然在人生路上入了宦竖赵高布下的圈套，“听高邪说，废嫡立庶”，最后落得个腰斩于市、身死族灭的可怜下场。读史至此，谁人能不生出无穷浩叹？李斯之败，到底败在哪里？

从《史记·李斯列传》的有关记述看，李斯之败的关键之处在于“私”字当头，利令智昏，以至于为保住一己之私利而把道德与法制观念抛到九霄云外，最后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一点上，李斯正如前述齐之“攫金”者一样愚蠢，未能过得名利关。

俗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追求功名，本是人的正常心理。但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功名，就必然会导致私欲膨胀，到头来身败名裂。李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功名之心，在师从荀子学帝王术、背楚去秦的行为中已表露无遗，而在辞别荀卿时所说的“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一段话，更表明他只计利害，而不会考虑任何道德和法纪的约束，能够把人推向邪恶深渊的“私欲”已经初露端倪。官拜长史后，李斯所献的“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的计策可谓阴损得狠。这充分表明，在李斯的政治哲学中，只讲利害关系，而道德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此，李斯在自己升任丞相、长子出任地位重要的三川太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满门荣华富贵后，最为关心也最为忧心的就不再是国家大计，而是如何防止“物极则衰”以持禄保荣的问题了。由于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当赵高晓以利害、给他下套时，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而其所赐长子扶苏的玺书还未及发。于是，在宦官赵高的导演下，秦王朝的悲剧开始了，李斯个人的悲剧也同时开始了。

赵高是始皇少子胡亥的老师，当然希望胡亥即位。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先毁灭证据再制造证据，也就是要扣压并毁灭始皇帝

令扶苏即位而蒙恬统军的诏书，再假造一份传位于胡亥而赐扶苏一死并令蒙恬自裁的诏书。赵高首先说服胡亥表示同意，然后找时任丞相、大权在握的李斯商量。李斯出于本能地认识到这是“亡国之言”，因而予以拒绝。当赵高分析到一旦“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扶苏即位后“必用蒙恬为相”而会罢免李斯时，李斯仍表示要保持臣节而不可负先皇之命。但当赵高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要改诏易主，并露骨地表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踏上了赵高为他准备的贼船。李斯之所以经受不住赵高的诱惑而堕落，其根本的原因正如司马迁所说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私害仁”。

在李斯和赵高的合谋下，秦二世靠政变即位。少不更事而又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秦二世被赵高玩于股掌之上。李斯为了自保，不但失去了忠言直谏的勇气，而且竭力取悦于二世、赵高。直到赵高收拾完其他政敌而对李斯下手时，李斯才如梦方醒，决定要在二世面前揭破赵高的阴谋诡计，为自己找一条活路。但为时已晚，他连深居禁中的二世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赵高一伙上下其手，屈打成招，腰斩于市，三族被夷。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李斯之所以走上身败名裂的不归路，关键就是被一个“私”字所囿。因为囿于一个“私”字，就可以不顾廉耻，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不守法纪；也正因为囿于一个“私”字，无法破除名利的障壁，最后身败名裂，为历史所笑。

观乎此，今之人能不慎哉？！

原刊《光明日报》2005年3月8日